

# 中西新旧之间的历史思辨

沈洁

在当代史学评价里,陈先生和他的“近代新陈代谢”被归入“进步主义”序列。这个归类,大致不差,陈先生确实有他对进步与落后的明确判断,他讲历史有“沉默的必然性”。但进步主义又远不足以概括其近代学中的“新陈代谢”。



陈旭麓先生(1918—1988)



重版《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》书影

讲述的变迁不是政治、经济、思想任何单一意义上的变迁,而是处在各种关系的交互作用下的变迁。因此,《新陈代谢》讨论的各种嬗替,皆如“燕鹊之有双翼,舟车之有两轮”,总是环环相因的。比如中体西用的问题,陈先生讲,天下滔滔,多的是泥古而顽梗的士人,在封建主义充斥的天地里,欲破启锢闭,如果没有“中体”作为前提,“西用”无所依托,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,落不了户的(第106页)。近代中国的两极相逢,使社会成为“变形的社会”,由此造成了事物的多种质态、多重外观。分析一个历史事件、一个历史时段,就必须注意前后的纽结与关联。

这些都是从具体史事中凝练出来的论断,高度辩证,又高度概括。辩证与概括,均源于对史事本身深透的理解。先生曾讲过“洒盐入水”的道理,所有的理论与方法须得溶于历史本身,撑起大要,又不落痕迹,才是上乘。这个道理,先生运用得炉火纯青。所以,他的这些论断,至今看来,仍熠熠生辉,而我们各自所关心的具体研究和具体问题,又皆能从中获得灵感。一部史著之所以长久流传,可能不在于它具体解决了什么,而在于它能牵引出的更多问题和给予阅读者的思考。

## 思想、社会与经济

本书题为“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”,打通思想史与社会经济史也是其一大特色。思想及写作,与人的社会经验有密切关系。先生身历过战争与现代中国的离乱,对民生有过切肤感受,在他参与主编的四卷本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》中,负责的是经济部分,对近代经济变迁下过功夫。所以,他说“我们总是想把政治思想看做是同社会经济亦步亦趋的,我们写戊戌、辛亥、五四不都是这样写的?但是我们的政治思想像朵飞在

《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》(以下简称《新陈代谢》)又重版了。这部起始于1980年代、成书于1990年代初的近代史著作,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,印就多少版、多少册数,几多人读过,已不胜枚举。而在2018年新年,拿到这本三联新版,想得更多的是,今天,我们读史、阅世、写史的人,为什么还要读它?该怎么读?又该在书中所倡导、书写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骨架之上,如何继续今天的历史观察与历史写作?

不夸张地讲,陈旭麓先生之后,治中国近代史者鲜有未受《新陈代谢》一书滋养的。这本书,从体例来讲,当属断代“通史”,但它不按类目,亦非面面包罗、一应俱全,而是将晚清至民初中国置于千年变化的脉络中,按照他自己对历史变迁的理解,以重要的时、势、人、事为区隔、为节点,编目而成。刘咸忻《治史绪论》将史学分为四端:一曰考证事实则为史考;二曰论断是非,是为史论;三曰明史书之义例,是为史法;四曰观史迹之风势,是为史识,“考论固在成书之先,然不能成书,则止是零碎事迹,不得为史;论断固为读史之的,然无识,则止是任意爱憎,不得为学”。《新陈代谢》一书诞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时代,然以“考”、“论”、“法”、“识”四则以衡,他又是一代

际的史家中既纯熟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与社会理论,又极能接续传统史学的一位。

因之,今日重读《新陈代谢》,我更关心的是,在身历数度史学思潮、史学方法的冲击后,在中国近代史研究这近三十年积累的大大小小的问题中,在从反对“宏大叙事”到反思“碎片化”的困境下,重新理解先辈史家勾勒的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主线与轮廓,这种“通”与“识”及其带来的整体眼光,对于我们历史叙事的方法、叙事的风貌,存在何种意义。

## “变”与“常”

近代中国“将几个世纪缩在一时”,“变”与“不变”即是陈旭麓先生近代史学的核心论题。

《新陈代谢》论中西新旧,是在一个思辨的、变动不居的逻辑下展开的。他讲的“变”不是简单的历史变化——后来对先前的替代,而将“变”与“常”联系在一起;他讲的新旧,亦非界线分明,还包括了新与新之间的代谢。晚清这个剧变时代,每十年都不一样,从洋务到戊戌,从立宪到革命,看似只是代际之间的递进和取代,但先生讲“新旧如环”——环者圆圈

也,但它不是循环的圆圈,乃是新旧不断的起承转合的圆圈。

1840年以降,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变局到危局的变化,摆在那一代知识人面前的,是各种各样的“不得不”,在世变中变通成法。从庚申到甲午,“自强”作为一种观念,是在三十多年的变局中被逼出来的。又以自强派生出富强,重点是在师夷智、借西法。所以,从洋务到维新,以至戊戌之后的越走越远,这中间的变化就在于,洋务是以彼邦之长技守护中国自身和中国的固有,而甲午惨败之后的维新,则是大张自强与富强,要务是“变法”,价值变了,本位变了,观念和理路都变了,李鸿章的“取新卫旧”变成了康有为的“除旧布新”。

陈先生讲,除旧比布新更难;但“新”往往是“旧”衍生的。洋务一代,办机器局、制造局,从他们手上也开启了旧学新知的交汇。正是传教士和江南制造局编译的新书,哺育了戊戌一代士人。从洋务派到早期维新派到戊戌维新,这中间是层层接续又层层启动的。而百日维新的失败,又意味着新一轮的一个结束与另一个开始——日后在中国掀动革命大潮的、更广泛的“革命一代”,多半都是读着梁启超、《新民丛报》鼓荡起改造与革命的激情。洋务哺育了戊戌,戊戌又哺育了革

命;这中间,还穿插了立宪派与革命派“由交替而并峙”,他们既是对峙的,又是联结的,其对峙和联结互为进退;反满之后的中国,则由“变”而越来越倾向“激变”与“巨变”;五四运动结束了戊戌以来的维新,又开启了一个时代。六十年间这三代读书人,洋务、戊戌与反满无非在围绕“除旧”与“布新”。他非常精准地引用了鲁迅在《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》中的一段话:“两种特别的现象,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,即是反复;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,即是孳杂。”反复与孳杂,亦即先生在在申说的——新和旧是对立的,表明了他们的不同一性,但它们互相转化,又具备着同一性(《浮想录》第57页)。洋务与维新有同一,维新与革命亦有同一,“改良派”与“顽固派”、“保守派”在思维上也有许多一致的地方。这就是《新陈代谢》讲述的“变”与“常”,勾勒出近代中国历史变迁中螺旋式的新旧嬗替。他对于中西新旧的认知,到我们这个时代,仍然未被超越。

这种复杂度与曲折性的呈现,陈先生是怎么达到的?非常重要的一点——他讲中西新旧,不仅仅是观念层面的东西,还包括社会经济、日常生活,甚至是斗争方式。他所